

唐山文史资料

第六辑

(唐山乡镇企业史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唐山市委员会教科文工作委员会

1989年5月

目前，我市乡镇企业正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和研究唐山历史上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以便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推动当今乡镇企业及乡镇其它经济的更好发展，本刊特将有关资料连同本刊发表过的“北方纸乡”、“林果实业家尹福清父子”、“丰南县猪鬃加工业发展简史”（有删节）三篇史料，编成这本专辑，供读者参考。

编 者

1989.2

目 录

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大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董宝莹	(1)
昔日乐事人经商发迹的历史	葛辛垦 王占云	(13)
北方纸乡.....	马咏春	(22)
遵化县“五小”工业发展史	李懋章 张祥云	(30)
兴旺发达的胥各庄货栈业.....	朱继经	(36)
遵化县的黄金开采史.....	徐连治 张祥云	(46)
丰南县猪鬃加工业发展简史.....	张惠民	(50)
玉田泥玩具.....	于宝利 孟昭林	(57)
漫话唐山乡镇企业史	崔光华	(61)
滦县采石业.....	唐向荣	(69)
闻名遐迩的瑞祥车行.....	张国才	(78)
“商界泰斗”武百祥	葛辛垦	(83)
建筑企业家董振邦	董宝莹	(94)
造纸实业家李显庭	马咏春	(101)
林果实业家尹福清父子.....	王建志	(106)
百年沧桑 独具匠心		
——介绍蓄毛工具专业户“剃子李”.....	李介之	(114)
玉田苇席业.....	孟昭林 王 合	(120)
迁安的桑柳编织业.....	迁安企业局史志组	(123)
近百年玉田土布生产概述.....	孙润芳	(125)
“开平王”牌刀具	陈虹刚	(127)
贯头山老白干.....	郭 武	(130)

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大 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宝莹

丰润县文化发达，毗邻京津，接触国内外政治、经济影响较快，读书走仕途、经商搞工业的也较多。从民国初年我国摆脱外资独立兴办交通事业以来，县内承包工程的企业相继兴起，而且串联影响发展迅速。到二、三十年代，计有复兴建筑公司、复元建筑公司、裕庆公司、大华建筑公司、大兴工程公司、裕兴公司、建隆营建厂等等。这些承包商对祖国建设有过不同程度的贡献，其中大兴工程公司较为突出的一个。

大兴工程公司的前身是沈阳附近的大兴工程公司，经理叫石景志。1925年丰润县披霞山乡郑庄子村的董振邦和丰润县韩城镇的常庆和，经人介绍来到大兴工程公司做事。董振邦负责收料管帐，常庆和负责工程技术指导。后来石景志借给他们四千块钱，介绍他们承包了奉海铁路清元县苍石附近一段山洞的开凿工程。干了几个月，挣了一万多元。

1926年原大兴工程公司解体，董振邦、常庆和联合早已在沈阳附近做事的边宪臣（丰润县新军屯镇大坎村人）等人接过大兴名号，重新组建了大兴工程公司。董振邦任经理，边宪臣任副经理，常庆和负责工程上的具体事务。此外还有董荫巨、张锡恩等人。不久，奉海铁路东段开工，经路段总工程师陈荫轩介绍，承包了“双崴子”一段山洞工程。干了一年多，挣了6万元，公司由是扩大。1928年又承包了吉海铁路黑熊沟山洞工程，全长550

米，招用工人两千多人，历经两年多完工，挣16万元。此间，他们在沈阳西门外建立了办事机构，同时在市内承包了东北大学教授住宅楼、沈阳火车站票房以及饶河钢筋混凝土大桥和辽东营口码头等工程。公司信誉、声望迅速提高，经济、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力量也逐步壮大。

1930年，杭江铁路开工。大兴工程公司分出力量承包了其中金华——贵溪一段路基修筑工程。因为长时期阴雨不止，到1931年底才完工，经济效益平平，但眼界开始由东北一隅扩展到祖国神州大地。他们看到大有作为的天地极为广阔。

杭江铁路完工以后，正赶上“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沈阳全被日军占领。日本人路其四郎表示愿向满州东亚公司经理狄野横推举大兴工程公司，保证包工从优。然而大兴工程公司领导看到东北已非中国人所控制，再干已非为民族尽力。于是贱价变卖工具和设备，将公司撤到天津。之后承包了开滦窑柱采购供应工作和天津海河治理委员会的北新河开挖工程、瞿家店水闸修建工程，以维持开支，伺机发展。不久，南京周围各省开始大规模建设，大兴工程公司决定把业务重心向南转移。1933年首先承包了粤汉铁路株韶段米河大桥工程。经过精心施工，连续奋战，在汛期前提前五十五天完工，工程质量优良，为全段通车创造了条件，获得铁路局长兼总工程师凌鸿勋的嘉奖，并训令全路表扬。这一成绩，为大兴工程公司的信誉在华南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从此，由经理董振邦牵头先后在济南、开封和西安设分公司。首先承建了山东台儿庄至潍县的全段公路工程。以后相继承建了河南洛潼（洛阳——潼关）公路、西荆（西安——荆紫关）公路、南荆（南阳——荆紫关）公路、信南（信阳——南阳）公路、潢三（潢川——三河间）公路全部的路基和桥梁、涵洞工程，以及陕西省政府大礼堂和洛阳龙门香山寺古迹修建工程。

以上全部交通线累计达一千一百公里。工程进展迅速，质量

也好，深得山东建设厅长沈鸿烈、河南建设厅长张静愚、陕西建设厅长雷宝华的赞许和表彰。同时也在一些主管工程的总工程师（如欧阳灵、黄庆慈、吴泽普）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良好印象，对后来大兴工程公司的发展播下了良好的种子。

与此同时，由副经理边宪臣牵头在杭州、南京先后设立分公司，陆续承建了江西省玉南（玉山——南昌）铁路、南萍（南昌——萍乡）铁路的路基和桥涵建造工程，萍乡市火车站的建筑工程。

1936—1937年，又承包了京赣（南京—安徽—江西）铁路南段（赣境）的八段、十段、十一段，北段（皖境）的十二段、十三段的路基、桥涵、山洞的建造工程。施工正热火朝天进行期间，

“七·七”抗战开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京赣沿线加紧施工。12月初，工程将近尾声，然而上海陷落，京赣铁路眼看被日军占领。大兴工程公司来不及结算工程款，就遵照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和路局的决定，陆续把职工遣返原籍。工地工具物料一部约三百吨由铁道部用轮船代为转移。其中一船被日机炸沉在长江里，其它运抵武汉后被铁道部使用。没有运出的物料工具全部遗弃。

大兴工程公司承担的以上工程难工险工很多，由于工人素质好，管理人员精、工程进展迅速，难度大的工程项目一个个地被征服。深得皖境工程处长容祖皓、赣境工程处长侯家源的赏识和表扬，也获得一些路局路段总工程师的赞许。截止到1937年，公司所获书面奖状共有四十多幅。以上成就的取得，为后来在大西南、大西北开展业务活动铺平了道路。

这期间，公司累计营业额达两千万元（当时法币与银元大体等值），盈利约计两百万元，固定资产总值约为四十万元（包括在京赣铁路损失的资产在内）。职工福利和股东红利收入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几年，全公司管理人员平均在500—600人之间，工人平均在12000人左右，最多达到过17000人。

在公司规模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许多方面渐渐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一系列问题刻不容缓的摆到面前：一是公司经营管理极需向科学化、正规化发展；二是急需尽快提高公司职员的专业技术和文化素质；三是公司活动总需取得政府在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这些事项均在1935年前后陆续实现（后面另述）。从此大兴工程公司进入了全面成熟、全面发展的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华东、华南、华北的建设全部停顿。大兴工程公司的全体职员于1937年末撤到天津及原籍。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集中在天津英租借地耀华里93号，研究未来经营方向。大家一致认为，应当转向大后方（指西南地区）为抗战出力。但在总结工作中对某些执行公司纪律不够严格和用人不当的问题认识有分歧，加之某些主要成员不愿远走大后方等原因，经过反复协商于1938年决定原公司停止活动，进行改组。改组后分别组成两个独立经营的企业。一个是董振邦为首的，沿用原名“大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兴工程公司”。一个是以边宪臣为首的，定名“大兴合记工程公司”。两个公司的成员分别于1938年末至1939年冬辗转经香港、越南到达昆明开展营业。

这时，从南京移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面对上海港口失去、广州港口难以持久、滇越铁路从越南港口出入满足不了抗日需要的形势，决定修筑滇缅、叙昆两条铁路，以打开从缅甸进口的通路。重新组建的大兴工程公司来到昆明以后，承接了叙昆铁路松林上山洞和威宁防空洞的开凿工程。同时还承建了51、52两个兵工厂的建造工程（与大兴合记公司联营）、宜良竹园坝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与建隆营建厂联营）、川中公路一段工程、滇缅公路下关段工程。1941年春又承建了四川40兵工厂的建造工程（与大兴合记、大华、工大等公司分片施工）、甘肃宝天（宝鸡——天水）铁路修筑工程。

1942年春，日军攻入云南南部以后，海路供应线全被封锁。同盟国（美、英）改以飞机空运支援国民党政府，并以飞机轰炸

日本国内军事基地和工业基地的方式对日作战。于是在云南、广西、四川、湖南、陕西等地陆续修建大型飞机场。大兴工程公司又先后承建了云南羊街重型机场的跑道及新津、广义、彭山、场，湖南桂林、零度机场，四川呈贡、巫家坝机场，陕西汉中机故城、郾县机场及美军空军后勤基地建设等工程。这些工程全部完工后，大兴工程公司的全部资产达到5000万元（当时法币贬值率为500：1），合黄金1000两。

以上这些工程对于运输军用物资，支援抗战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八年抗战期间，公司全体职工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屡受挫折。当日同仁有的自动离去，有的因病逝世（如杨辅庭），有的因战事牺牲（如张俊生、董庆云）或失踪（如杨凤春）日本投降以后，大兴工程公司同仁感到民族复兴在望，一致同意董振邦的意见，只以盈利之小部分分红赡养家属，大部充作公司资本，决心在重建祖国的高潮中大显身手。于是派员分赴南京、湖广、陕甘等地建立基地，开展业务，准备大干一场。不料国民党大打内战，不搞建设。从1946年到1948年，只在粤汉天兰等铁路、河南大学、葫芦岛港、塘沽新港、京门公路等处做些工程，经济效益微薄。再加法币贬值加剧（1948年贬值率为3000000：1），公司勉强维持，最后不得不全线停业。董振邦与其弟董维域于1949年1月去台湾考察，拟相机恢复营业未果，乃于1949年9月和1950年5月相继返回京津。新中国开始恢复建设以后，董振邦重组公司，并于1951年4月在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中央私营企业局第一个注册登记，定名《大兴建筑股份两合公司》。前后承接了清河制呢厂、华侨补习学校、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天津久大精盐公司、茶淀农场、航空油库等建筑工程，重新做出一些成绩。1952年“五反”运动中停业清理，接受处置，职工陆续到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参加工作。

1938年从原大兴工程公司分出去的以边宪臣为首的大兴合记

工程公司于1939年到达昆明，承接了51、52兵工厂、四川40兵工厂，滇缅公路，叙昆铁路，羊街、呈贡、巫家坝、新津、彭山等机场的部分修筑工程。1945年承接了宝天、天兰两条铁路的部分工程。1948年回津与张锡恩合作，恢复大兴合记公司业务，营业情况正常。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边宪臣与边宪华、边宪麟两个弟弟同空军司令部合营，组成“北方建筑公司”，共完成杨村、琢县等四处飞机场的修筑任务，营业额400亿元，获利39亿元（与以后新币比值为10000：1），未及分配，“三反”“五反”开始，北方公司、大兴合记公司相继停业接受处置，边氏兄弟均获罪（现仍在申诉请求纠正中）。其余职工陆续参加工作。至此，大兴工程公司两股力量走完了二十六年的历程。

综上所述，大兴工程公司发展迅速，在国家建设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其原因主要是：

1. 善于抓住有利战机

企业要发展，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较好的业务环境和决策人员审时度势，抓住有利的战机，做出正确的决策。

大兴工程公司有两次重要抉择。一次是及时捕捉到东北张学良将军为摆脱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要大力进行东北地区的交通、文化建设的信息，公司毅然决定奔赴东北，在那里承担了铁路、桥梁、山洞、海港码头、校舍等一系列重大工程，从而逐步奠定了企业发展的经济基础，逐步积累了工程技术和企业管理的经验。另一次，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强烈的民族气节使得他们将公司从东北撤到天津。此时他们又抓住国民党把全国政治中心迁到南京，政权暂时稳定，开始在河南、安徽、陕西、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大搞交通建设的时机，于是，又果断地将营业中心南移，在那里完成了大量工程任务，使得公司规模迅速扩大，实力大增，并且由此引出一系列重要变革和发展，使自己成为全国很有影响的建筑企业。大兴工程公司这两次重要抉择，对它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2. 下大气力创出公司高信誉

大兴公司初创时期，负责人董振邦、边宪臣虽然年纪尚轻，但已历经很多坎坷。靠投机取巧、坑蒙拐骗走绝了自己路的例子，他们目睹了许多。加上家庭的影响，他们深深地懂得脚踏实地走正路，靠真挚和诚恳取得全社会的信任，这才是公司生存并得到发展的保障。所以，他们眼睛看的，嘴上喊的，手上做的，都集中在一个“质”字上。他们省吃俭用，宁可少挣一些多累一些，也尽力保证质量，使工程做得令甲方满意。这样不久，大兴公司就成了东北工程建筑界里十分吃得开的企业。后来公司发展了，因为经理与各段监工、老板都悟出了这一成功的绝窍，就都更加自觉地在自己工作范围内努力维护和提高公司的信誉，如，1930年修筑杭江铁路金华——贵溪一段路基时，因为长期阴雨，路段处于低洼稻田之中，积土很难夯实。副总经理边宪臣亲临第一线，指挥多次返工。他父亲逝世也都没有赶回奔丧，最后保证了工程质量，收入却受到一定损失。完工后，他回到公司一面给同仁磕“孝头”，一面为没能给公司赢得经济效益面报歉，反复说道：“对不住大家！”。面公司同仁一致称赞边宪臣，说他做得对，经济上受损失事小，保住公司信誉事大。边副经理宁可担起不孝的罪名，也不放弃维护公司信誉的责任，为全体职工作出了榜样。

大兴工程公司努力追求的，正是甲方负责人所希望的。因为他们设计的工程要保质保量地完成，急需值得信赖的承包单位。工程中对时间和质量的一些特殊要求，常常成为他们的沉重压力。这时他们更需要一些值得信赖的骨干承包单位。因此他们非常赏识大兴工程公司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在精神。他们与大兴公司结成了相互依靠的关系。这就使大兴工程公司得到了极有保障的业务来源。他们的业务活动也得到甲方负责人的热烈支持。

3. 体制与制度使大兴工程公司保持了活力

根据公司急剧发展，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的实际情况，从1934

年末开始逐步着手了体制与各项制度的建设。到1935年底，公司建立了包括《会计制度》、《人事制度》、《工人劳动保护制度》、《伤亡抚恤制度》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聘请了会计和法律顾问，使得各项事务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工作纳入了正轨。同年，大兴工程公司为进一步取得法律保障，正式向南京政府实业部申请注册登记。注册的法定名称是：大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法名简称是：大兴工程公司。

根据在南京政府申请及注册的名称，大兴工程公司实行了股份制。由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董事二十多人。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大政方针。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保证股东大会决定的方针政策贯彻实施。公司是具体的办事机构，设总经理一人（即董振邦）、副总经理一人（即边宪臣）。设总监工一人，副总监工若干人，共同主持公司的具体事务。

根据各地工程分布情况，公司还在外地设立一些分公司。分公司设经理一人，副经理一人，监工、老板若干人，负责管理邻近省份的工程事务。

公司承包工程，由总经理或副总经理带领工程师、会计师经过实地勘测和详细核算后进行投标。中标后根据工程特点和每个职员特点，临时组织办事机构负责该项工程。公司初创时期，施工采取自招工人，由公司直接组织劳动，采取计时或计件办法向工人发放工资。后来随着公司发展，经营方式改为通过包工头向公司分段承包工程。包工头由公司总领劳务收入，对工人实行再分配；公司或分公司负责物资供应、技术指导、质量检查、对外交涉、劳动保护、医疗卫生以及对包工头的一系列配合与监督。

公司内部的分配制度有两种。属于股东的职员，实行股份分红和工资的双轨制。非股东的职员（包括招聘的工程师、会计师），实行的是工资加馈赠。

公司股东根据自己在公司内的地位、作用，在公司内拥有一

定数量的股份。他们除按月领取一定数额的工资外，还根据盈利情况得到公司不定期的按股分发的红利，约计1—2年一次。这样，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每个股东的切身利益。

公司对于招聘的一般职员，采取的是低工资高赠送的办法。以1935年前后为例，职员每月每人30元。而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对他们的赠送却是相当可观的，有时竟高出工资数倍。他们的收入与公司股东相比虽然差距较大，但是由于股东是公司资产的所有者（其中部分股东还是公司的创始人），再加上股东时刻为公司命运辛苦操劳，承担风险，所以都无怨言。若与其它公司或社会上的其它行业相比，自己的收入就显得高许多。所以在大兴工程公司供职的人自身都有一种幸运感，都愿意在大兴工程公司长期干下去。

此外，大兴工程公司还重视在职员中或工人中提拔人才。有才干的可信的职员随时都可得到提拔。如张子亚、任宝奎、王贵祥、郑福祥等老板，原来都是一般职员，因为兢兢业业地工作，尽力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先后提为各工段或分公司的负责人，成为公司里很有地位的股东。公司赏罚分明，对某些做出有损公司之事的职员也常常依照规定加以辞退。因此职员们把维护公司利益同维护自己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把公司的发展壮大看作是自己的切身利益。

4. 关心爱护工人，形成坚强可靠的劳务队伍。

大兴工程公司的负责人不是由财主富翁转变成的，也不是由官吏豪绅转变成的，他们原来都是工人或雇员，都懂得工人是企业壮大发展的最基本的力量。所以，他们一直真诚地依靠工人大众，关心他们的疾苦，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

第一，他们对工人不坑不骗。他们尽力让工人得到应得到的报酬。公司初创时期，他们宁使自己少提取利润，使工人工资高出其它公司。如果工程干得好，开工资时还给工人另外再抓上一把银元。后来公司发展了，工程采取与工头承包的方法后，又采

取了工程量与承包价向工人全部公开的办法，使工头不得在克扣工人上大做手脚。此外，公司在各工段发放工资时，还派人前往调查了解，发现克扣工人的工头，公司不再聘用。

公司从爱护工人的角度出发，工人工资都等放工前发放，平时存在柜上，以防丢失或不正当花费掉。发放工资时，公司严厉监察各工段，不许聚赌，不许逛妓院。以后到1935年又明文规定，不许赌博，不许嫖娼，不许吸鸦片、抽白面、扎吗啡，不许偷盗，不许打架，不许在工地附近讨女人。如有违犯立即开除。这样，既可使工人收入全部用于赡老抚幼，养家糊口，又防止了工人在当时社会漂流中因走歪门邪道而毁弃一生。

大兴工程公司这样要求，这样做，深受工人及家属的称赞和支持。

第二，他们对工人关心爱护。公司初创时期，统一为工人开办伙食。当时别的公司是高粱米饭萝卜条盐菜；大兴工程公司增添了大米饭、馒头等饭食，熬豆芽，饭后还供给充足的菜汤。后来由包工头为工人起伙时，公司为各工地统一购买粮食，以保证各工地伙食都有较好的粮食品种。公司还随时检查工人伙食的质量和卫生状况，以保证工人吃得饱、吃得好。公司还规定常年不让工人喝生水，夏天高温季节让工人喝绿豆汤，以保证工人的健康。

为了防病治病，公司逐步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医疗机构。到1935年，大的工段都建有医疗所，每次聘请初、中级医护人员十几名。小的施工段安排有巡诊医生。以做好防病治病工作。当时工人患病负伤都能得到及时治疗。实在治不了的及时送地方大医院，很少出现贻误事故。

公司对工人的生活考虑得比较周到。比如工人到工地干活，一来就是一年半载，加上路途遥远交通不方便，换季更换衣服都不能靠家中捎递解决，公司就负责统一制做，需用时由工头支领分发给工人。

大兴工程公司还注意加强劳动保护。如规定工人在开山凿石

工程中必须戴安全帽、穿劳动服（公司负责提供）；山洞内放炮后采用人力向洞内鼓风（用风车），待有害气体散尽方可进洞作业；在有害气体区域工作时，必须戴防毒面具或口罩等。到1935年，公司还制订了《工人医疗卫生制度》、《工人劳动保护制度》、《工人伤亡抚恤制度》，报请当时河北省政府审核批准（因当时工人均来自河北省境内），使工人的劳动保护、卫生医疗、伤亡抚恤制度得到政府的认可和监督。

大兴工程公司的工地劳动相当紧张，每天劳动时间在11小时以上，关键时间中午把饭送到工地。有时工人们边吃饭边干活。公司对劳动质量要求得也非常严格。但是因为工人对大兴工程公司的信任感和亲切感，劳动热情十分高涨，劳动效率相当高。

由于较好地处理了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保证了工程的工人来源。当时，大兴工程公司形成了固定的招工区，每个招工区都有可靠的工头为公司服务。壮工主要靠保定、沧州、衡水几个地区提供。保定地区的工头是韩连庆、韩连登、韩连生，沧州地区的工头是李玉祥、李玉泰、刘继成、杨风春，衡水地区的工头是刘俊臣。其它技工也有固定区域，如木工是保定河间府的，瓦工是宝坻、武清县的。每当公司有工程的时候，打算从那个地区招工，就把那里的工头请来，讲明要什么样的人，要多少人，他们回去就招。由于大兴工程公司在这些地区声望极高，所以工人完全可以保质保量地招上来。有时工程紧急，给工头去个电报，工人连组织再上路，十来天就可到达工地。这是当时其它工程公司不可与之相比的。一系列可靠招工区的形成，使得大兴工程公司可以信心十足地承接一个又一个大规模、高难度的工程。在当时工程公司强手如林的情况下，这是大兴公司能长足发展的重要条件。

5. 重视知识，下大力培养人才。

大兴工程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施工覆盖面越来越广，难度大、复杂性强的工程越来越多，公司感到，靠感性知识指导施工，

靠旧方法旧制度来管理公司业务，远远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非尽快培养引进新型工程技术人员和财会管理人才。

开始他们采用招聘兼职、雇用专职的作法以应燃眉之急。1935年延聘同济大学姜耕畲、雍惠民，唐山交通大学陈琨、上海交通大学赵春官等几名工程师，从天津中国银行延聘会计主任林友堂和天津著名会计师韩××，分别担任公司的会计主任、法律顾问和会计顾问。

后来公司规模进一步扩大，靠延聘少数技术、财会人才已解决不了日益发展的急需。于是公司又采取了大胆的措施，举办培训班，走自己培养人才的道路。

1936年第一期工程训练班在天津开办了。地址在英租界地66号路61号。以后又搬到陕西西安。总经理董振邦兼任训练班主任，副总经理边宪臣兼任训练班副主任，天津河北工学院老前辈张幼琴任训练班副主任，主持训练班具体工作。公司董事长董维城、董事常庆和等任训练班董事，负责协助工作。在工程训练班授课的讲师有工程师雍惠民、赵春官，此外还有刘子周、陈宝珊、陈戈平、苏良赫等人。工程训练班共办了三期。第一期招学员13名，第二期招学员约40名。第三期招学员约30名。在办工程训练班的同时，公司还办了一期会计训练班，招学员约有30名，由会计师林友堂和韩××授课。

训练班的学制为二年，授课方法是一年室内讲授专业知识，一年到现场边实践边学习。学员毕业时进行了严格考核，公司向成绩合格者发放了毕业证书。毕业的学员不仅以后在大兴工程公司作出重要贡献，其中多人还成了解放前后国家建设的杰出人才。

知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逐步壮大了公司的工程技术和科学管理的力量，使公司的实力大大加强。

昔日乐亭人经商发 迹的历史

葛辛星 王占云

解放前，乐亭县人以善于经商闻名遐迩。他们先以东北三省为发祥地，后拓展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为疏通国内外流通渠道、繁荣市场，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在经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出了一套“生意经”。他们经商致富以后，念念不忘故乡人民，慷慨捐资，创办学校，帮助家乡培育人才。

贫因出走闯关东

谋生途中务经商

乐亭县地处冀东大地的东南端，南临渤海，北傍滦河，全境属滦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气候温和，适宜耕作，利于治

鱼。然而，这块宝地在封建社会的桎梏下，生产力低下，资源得不到开放。地少人多，土地又多集中在地主人家手里，因此绝大多数人民不得温饱。旧县志曾有这样记载：“全县所产之粮，既在平年，亦不敷半年之需，若遇荒年，则饿殍遍野，满目惨状。”“民以食为天”，乐亭县的穷苦人民，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离乡背井，自谋生路。在外流的人群中，闯关东的人数最多。开始，他们到关东出卖劳动力，后来有人发现东北有广阔的市场，做生意可以获利，于是便有人走上了经商之路。

乐亭县最早去关东经商的是刘新亭和张希孔。刘新亭，

乐亭城北刘石各庄人，生于清道光年间。自幼家贫，能吃苦耐劳，身体健壮。他在闯关东谋生以后，发现东北各地特别缺锄板子，土布、棉花也比关里贵。于是他便想到贩卖这些物品从中牟利。开始没有资本，他就向亲友借贷。没有铁路运输，又雇不起脚力，他就自己肩挑贩卖。后来赚钱多了，就雇用大车贩运。去程运锄板、棉花、土布到东北出卖，回程运粮豆、土烟叶、兰靛（一种土染料）到关里销售。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获利达万贯（一贯一千个铜钱）。接着，其子刘如璜继承父业，进一步扩大经营。先在龙湾（今农安县）开设了广发合商店，根据市场需求，由经营杂货到钱粮业，后又发展为经营百货兼营汇兑等等。又经过数十年的经营，积累资金达千万贯。到刘如璜三个儿子分家时，除商号铺店外，他们各立门庭，自立堂号，在东北宽城子（今长春市）同时开设了泰发合、益发合、东发合三大商卖号，人称“合”字号的买

卖。到清末民初，其分号发展到几十处，遍及东北各地，规模居东北首位。从此刘家成了“京东第一家”富户。

张希孔，乐亭城东小黑坨村人，生于清道光年间。木匠出身。因家境贫寒，生活无着，他带着两个弟，沿途乞讨，来到船厂（今吉林市）一家木匠铺里当杂工。张希孔为人忠厚，干活殷勤，后来受人资助自己开了小木匠铺。适逢东北“木帮”们从东山里砍伐的木料积压在松花江畔，一时难以售出，便赔给了张希孔，言明次年秋后来取钱。但过了四年，对方也未来取钱。这时正赶上船厂失大火，灾后各家盖房急需木料，他便将所存木料全部售出，获了大利。他用这批资金在船厂开设了万合木局。后来随着收入增多，又在宽城子开设了万合兴、万增兴两座商号，并兼营木业。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发了大财，到清末民初，张希孔成了乐亭县四大户之一。

刘、张两家闯关东经商而发迹，启发了乐亭人。于是人